

惊天骗局

——“惠民公司”招募一战赴欧华工始末

1916年5月，在天津大经路（今中山路）北侧的二马路仁寿里口，突然冒出一个叫“惠民公司”的机构。这是一家专门负责向一战时的欧洲战场输送参战华工的机构。该公司把华工待遇说得天花乱坠，天津及周边贫苦居民纷纷报名欲去淘金。大经路一时车水喧嚣，人头攒动。不久后，第一批5047名受蒙蔽的华工体检合格后，欢天喜地踏上了留洋之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通过“惠民公司”的赴欧华工累计超过14万人。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这些华工除了被直接编入军队参战外，从事的重体力劳动也多与军事相关。受罪不说，许多人竟充当了炮灰，葬身异国他乡。如今，在法国诺莱特、巴伦、巴纳克等地，仍有多处一战华工墓地，至少安葬了2000人。每年清明节，旅欧华人和国际友人都前去祭奠。

一战爆发后，英法等协约国兵员锐减，人力资源匮乏。为挽回颓势，招募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劳工赴欧参战或从事勤务的这个馊主意，便被摆上了桌面。明守中立的北洋政府，渴望参与国际事务、谋求国际平等，但在此事上他们明显持有侥幸心态，认为暗中参与的“以工代兵”之举，即可以得到实际利益，日后更可以瓜分胜利果实。

为了避免引起德奥等同盟国的不满，梁士诒等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暗度陈仓。代表法国国防部的陆军上校左治·陶履德假借法国工厂农学技师的名义，组成官方招工团来华游说。承揽招募事宜的“惠民公司”在津设立，对外称商业性质，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为全权总代表。1916年5月14日，双方订招工合同，假借“招得之工人，决不干预各交战国的各项战事，职务仅系为工厂及农务使用”之名，计划招募20万人，在“理论上”受雇于法国私营公司。

“惠民公司”总部虽设在北京，但却由天津的分公司包办，由李兼善、王世琪具体操持。除在寺庙、集市、茶馆等公共场所张贴告示、大肆宣传外，还通过帮会势力蛊惑民众。收容所设在塘沽租界招商局栈房。“惠民公司”充当了不光彩角色，每招一名华工



赚取酬金100法郎，而且将每人的安家费扣发一半。不明真相的华工们从天津大沽口分乘“安派”、“西义藏”、“阿利么”等船只远涉重洋。起初看出端倪的华工被视为“滋事者”，遭到镇压。德国大为恼火，在抗议无效后，散布言论，设法阻挠，还趁夜在天津口岸偷运百余华工逃走，甚至派潜艇在海上攻击运送华工的船只。尽管如此，1916年8月24日，首批华工辗转抵法。

此时，天津人民的反战情绪高涨。“老西开事件”使反帝斗争正轰轰烈烈的上演，也重创了这场招募骗局。天津的许多商界、业界名人联合上书直隶省长，极力劝阻“勿令再募，以重人道。”果然，招工合同上写明的多项权益，在实际中均大打折扣。后来，每月扣除华工部分薪水，经巴黎中法银行汇回天津，由法国驻津办事员和惠民公司设法交给家属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许多家属拿不到钱。在报刊披露克扣薪水内幕后，“惠民公司”成为众矢之的。华工家属甚至大闹直隶交涉使署（遗址在月纬路十中北院），大经路沿街一时哄哄然，如市集般喧扰。天津八善堂也多次集会，认为“侨工局招募华工出洋规则，不但无保护之条，且尤不益于

华人，已达极点。”各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无官厅宣布募工条件”，“断无良好结果”，并提出修正章程要点。

“惠民公司”还在上海、香港、青岛等地开设分公司，“间接招工”约4万人。加上从其它途经赴法、英、俄的华工，累计超过14万人。这些华工除被直接编入军队参战外，从事的重体力劳动也多与军事相关。北洋政府华侨工事局认为华工“名誉颇佳，成绩可睹。”然而，华工毕竟出师无名，在战争条件和粗暴管理下，待遇很差，满腔血泪辛酸。到1918年，有案可查的华工罢工、暴动等就有30多起。战后他们也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国民待遇，英法当局竟把贡献巨大的华工视为“妨碍地方安定”的替罪羊，迅速遣返。但因逃跑、通婚、流落等因素，也使不少华工滞留，这成为中国向法国移民的第一个高潮。数万返华的华工在津遣散时，“惠民公司”却不予善后，曾提出的华工返乡后有十元大洋安置费的承诺，也非每人都兑现。总之，劳工返华的各项环节，均组织不利，未能切实维护劳工权益。而焦头烂额的“惠民公司”也在1921年销声匿迹了。☆

（责编 / 李斌琦）